



台灣英語教育的演進與前瞻思維

The Evolution and Vision of Taiwan's English Education

人文
科技
一展雙翼

李振清 / 世新大學英語系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深入探討台灣英語教育的歷史發展過程，以及以英語為媒介的整體教育對促成台灣現代化與民主化的影響。論文首先追溯到「庚子賠款」留學生選送赴美國深造所引發的華人英語潮流，以及1950年代以後部分菁英回到台灣所帶來的初期教育改革思維。1960年代的蓬勃學風，與1970到1990年代台灣的現代化、民主化與海外留學熱潮，進一步促成英語教育之蓬勃發展與國際人才培育的興盛。然而，到了世紀交替之際，留學熱潮與各級學校的英語文教育成效，因社會變遷與價值觀轉移而逐漸滑落，也促成政府當局對提升全民英語能力措施的嚴重關切。本文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台灣英語教育的興衰原因，並提出前瞻性的改革方案。

關鍵字：英語教育、英語教學法、教育改革、教育國際化、人力資本、語言能力、測驗與評量

Abstract

Taiwan had its proto-type English education started from scratch in the 1950s without any resources or technical know-how. However, it inherited the legacy of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cholars who entitled the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the U.S. in the 1910s. Modernization of Taiwan starting from the 1970s has subsequently enabled the high-tech powerhouse to successfully reform its English education system. The paper depicts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English educa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attempts to propose some pragmatic views and best practices for rejuvenating the nationwid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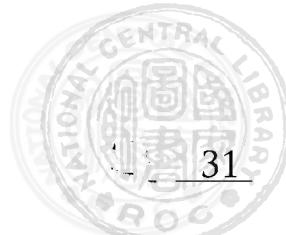
Keywords

English education, education reform,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EFL pedagogy, human capitals, language skills, testing and evaluation

英語是台灣藉以跟世界接軌、汲取先進知識來提升台灣整體的教育品質、人力資源、人文素養、經濟發展與高科技境界，從而讓台灣邁向國際化，並提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媒介。這種建立在優質教育、以英語為工具，得來不易的台灣軟實力（soft power），可從傅立曼（Thomas L. Friedman）2006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以及今（2012）年3月10日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專論“Pass the Book. Hold the Oil”¹中，得到印證。在《世界是平的》的第344頁，及“Pass the Book. Hold the Oil”一文中，傅立曼反覆稱讚台灣為「人力資源的典範」：

Taiwan is a barren rock in a typhoon-laden sea, with virtually no natural resources – nothing but the energy, ambition, and talents of its own people — and today it has the third-largest financial reserves in the world. (p. 344)

台灣只是颱風肆虐的海中之一禿岩，它幾乎沒有天然資源，僅有人民的精力、雄心與才智。今天，台灣卻擁有全世界第三大的外匯存底。



傅立曼對台灣的稱讚源自我們過去的國際教育成效，以及藉由永續的「英語力」所培育出的「人力資源典範」。此種事實與讚美，也出現於1995年2月21日《紐約時報》由資深記者Ashley Dunn所撰寫的頭版專論：“In New Brain Drain, Skill Asians Are Leaving U.S. for High-Tech Homelands.”²（在新一波的人才外流趨勢中，具有技術能力的亞洲人正在離開美國，回到他們的高科技家園。）

短短不到20年，包括台灣在內的亞太地區先進國家，儼然成為世界科技研發、金融發展，與高科技術產業設計的領航者。平心而論，這一切二十一世紀的傲人成果，均跟以英語為主體媒介的國際化教育有密切關連。英語對台灣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回顧台灣英語教育演進歷史，再反思現時各級學校的英語教育狀況，並展望未來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勿庸質疑，英語仍會一直扮演著建構廣大國際知識體系、促進國際交流不可或缺的觸媒，因為英語早已成為無所不在的國際語。³因此，在這台灣高等教育發展面臨國際挑戰的關鍵時期，深入探討台灣英語教育的演進與前瞻思維，有其必要與重要性。

壹、台灣英語教育的沿革與發展

台灣英語教育演進的歷史，及其對近代史上台灣現代化、國際化與民主化發展，以及現代人才培育的重大影響，是一樁極值得深入探討的教育與社會課題。隨著社會變遷，和「以考試為導向」的台灣教育傳統之延續，英語教育的發展過程、政策革新、教學更替和相關論述，不斷地產生起起伏伏、眾說紛紜、百家爭鳴的效應。

從大陸時期大家對英語那種陌生好奇的年代，以致於常以國語發音套用英語的「德先生」（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賽先生」（賽因斯 science）⁴、三十年代文學常用的「密斯特」（先生Mr.）、「密斯」（小姐Miss）⁵，或現代社會仍套用的「意譯音譯合一」之「傳思類型」（translation）⁶，到20與21世紀的英語文「聽、說、讀、寫、譯」「全方位」（holistic）教學⁷，

以及進一步的電腦輔助教學與文書處理系統、多媒體、數位和資訊高科技的廣泛應用⁸，甚至電子郵件（e-mail）與臉書（Facebook）等系統的應用於英語學習⁹，我們真正體會到了台灣英語教育的歷史演進，與快速而持續的蛻變。

在這整個英語教育的發展過程中，五十與六十年代先後由沈亦珍、英千里，以及梁實秋等英語教育前輩教授編撰的教科書，開啟台灣近代正規英語教育的先河。其後，台灣與英美兩國的合作，先後藉由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¹⁰，與美國傅爾布萊特基金會（Fulbright Foundation）、東西中心獎學金（East-West Center Grants）、亞洲協會（Asia Society）教育基金，以及美國各大學豐沛的獎學金等等，培養出無數的台灣現代菁英和英語教育人才。此種發展與國際協助，延續至今，對台灣英語教育與教育國際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多元化影響。

英語教育的正面發展所帶來的效益，與台灣的國際發展及提升國際競爭力有密切的關係。根據教育部黃前部長榮村的報告，¹¹「為了因應二十一世紀的多元知識發展，與台灣進入世貿組織(WTO)後所面臨的各種環球政治、外交、經貿、文教、科技等專業領域的嚴峻挑戰，『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提昇全民英語能力』，已經形成為國家發展的極重要政策選項。」他再三呼籲，「有鑑於英語已自十九世紀起即已成為全球最通用的國際語，藉『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提昇全民英語能力』已是各非英語系國家的重要教育政策。英語的國際化及其扮演的時代角色，日形重要。」

行政院於2002年2月27日行文指示各相關部會，「以『挑戰2008』做為中程目標，研議一項為期六年，包括經濟、人文與生活三個面向之國家總體建設計畫。其中，「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提昇全民英語能力」，就是「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的重點主軸之一。¹²此項計畫，首重全民基礎力的培養、雙語環境的建置，以及國際化教育的延伸與推動。

為了落實「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有關「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提昇全民英語能力」的工程，從2009（民國98）年6月18日起，到



2011（民國100）年12月16日期間，總統府、行政院、教育部、人事行政局及相關部會，共計召開了30次以上，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層級主持之「提升國人英語能力策略」的相關規劃會議。¹³由此可見英語教育在當前國家政策中的定位與重要性。筆者應邀參加其中大部分之會議，因而深深體會政府對現代英語教育與「提升國人英語能力策略」至高度重視。

平心而論，從歷史與客觀的角度來論述，台灣近70年來的英語教育政策與學生學習成效縱有瑕疵，然而政府的努力，與持續推動國際間的積極教育交流、合作、發展等措施，還是值得肯定。至於當前英語教育當前面臨的嚴峻挑戰，以及未來政策的前瞻思維，則值得政府當局與全體關心英語教育的大眾去深思。

貳、追溯台灣的英語教育歷史

追溯台灣的英語教育歷史，或探討台灣英語教育的發軔與蛻變，我們不能僅自限於台灣近六、七十年的發展，而應追溯到164年前，第一位赴美進入耶魯大學留學的容閎，以及「庚子賠款」留美學生的緣由，與對台灣英語教育的長期影響。

一、幼童赴美與「庚子賠款」留美學生的啟示

整體的台灣英語教育歷史與現代發展，還是不能切割更早時期，始於1872年（清同治11年），選送幼童赴美留學，以及「庚子賠款」留美學生的重大與實質影響。1960到1990年代大批台灣菁英學生赴美國與歐洲留學，並為台灣掀起開放、改革與現代化的思潮。此均與早期英語教育的歷史演進、發展有密切關係。

前台大校長孫震教授在〈《留美八十年》序：留學生的報國懷鄉〉（1999）中，特別強調從華人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於1846年赴美深造，到1850年畢業於耶魯大學，開啟華人接受現代美國高等教育培育，進而開啟了華人社會嶄新的未來，尤其是台灣社會的歷史發展、英語教育提升，與現代人才培育的關連性。

孫震教授在文中特別指出台灣與美國教育文化

的密切關係，以及其後的深遠影響：

自從1950年以來，台灣有所謂「人才外流」的問題。大學畢業後出國赴美深造的人數，隨著國內高等教育的發展，逐漸增加，從1950年代每年二、三百人，到1960年代二、三千人。到了1970年代和80年代，每年有五、六千人，甚至高達七千餘；多數出國後久滯不歸，引起嚴重關切。不過大學畢業階段出國求學，很難認為已達到「人才外流」（Brain drain）的程度。不如視為一種「人才資本流動」（Human capital flow）。

孫震前校長的上述觀點，正是現代台灣英語能力提升，並藉此參與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寫照；同時也驗證了美台文教關係所促成的現代「台灣奇蹟」，以及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美譽的背後因素。¹⁴

1872年的選送幼童赴美留學成效並不明顯，但八國聯軍事件後的「庚子賠款」留美學生之實質關連，卻對現代台灣的英語教育發展有間接，但極重要之影響。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逼迫滿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9月7日簽訂賠償4.5億兩紋銀的辛丑合約。¹⁵其中，較為厚道的美國，於1908年7月11日，將所得「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作為經由國際教育的途徑，資助派遣赴美留學的學生之費用。這些早期的留美學生，必須具備英文的基本溝通能力；赴美後，直接入美國大學和專門學校，並在農業、機械工程、礦業、物理、化學、鐵路工程、銀行、法律、政治、財經、師範等領域深造。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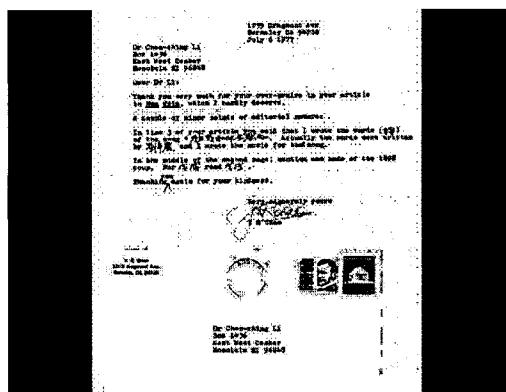
此後，中美雙方還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務部，負責規劃建立一所留美訓練學校，並於1909年6月在北京設立了遊美學務處，招考第一批學生47人，於10月份赴美。這也就是後來「庚子賠款」留美學生的由來。這批現代教育界所熟悉的留美菁英學生，在歐美一流學府深造，後來成為影響中國與台灣近代學術文化界的翹楚，也是開啟英語文教育的先驅。其中的胡適之（康奈爾）、趙元任（哈佛）、林語堂（哈佛碩士、德國萊比錫博士）、梁實秋（哈佛）、王寵惠（耶魯）、蔣夢麟（哥倫比亞）、梅貽琦（Worcester 理工學院）、薩本棟



(Worcester 理工學院)、馬寅初(哥倫比亞)、方東美(威斯康辛)、李濟(哈佛一人類學系)¹⁷、蔣廷黻(哥倫比亞)、沈宗翰(伊利諾)、董顯光(密蘇里新聞學院)等近代台灣所熟悉的產官、學界泰斗，都是因承接了時代給予的機會，與英語能力的具備與提升，在國內外發光、發亮。他們的精神遺產(legacy)所展現的前瞻思維、英語文的重視與推動，對1949年後的台灣初始英語教育與國際學術發展與影響，確實具有實質與啟發性的絕對作用。

以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聞名國際的語言學大師趙元任、五四新月派文學家暨台灣英語教育啟蒙者梁實秋，與以中、英文著作聞名的文學家林語堂為例，他們的中英文文采、英文學術著述與研究，以及對後進的啟迪和影響，等於直接、間接地培育並影響了散佈全球各地的無數現代台灣菁英與英語人才。

筆者在留學美國期間，和其他前輩學者如丁邦新、李壬癸、鄭錦全等，就曾受到國際語音學大師趙元任教授，及語言學家李方桂教授的指點，獲益良多。



曾是「庚子賠款」留美學生，先後任教於哈佛大學與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語言學大師趙元任教授，對海外留學生非常照顧，也經常悉心給予指點。圖為趙元任教授於1977年，以英文函覆筆者，討論學術的信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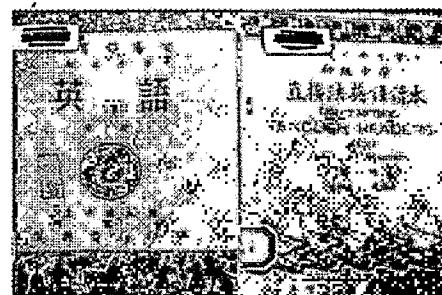
二、台灣英語教育的發軔與演進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我們的祖先渡海來台後四、五十年，因為農業社會發展的關係，從未接觸過英語。真正的英語教育之發軔，應該是第二

次世界大戰與政府播遷來台之後。筆者於民國42（1953）年由國小畢業，進入（省立）高雄中學初中那一年所經歷的英語教育，正好可作為探討台灣英語教育的發軔與演進的軌跡。

高雄師範大學教授鍾榮富在〈〈英語〉教學法的歷史〉¹⁸一文中所論述的要點，正好與筆者的立論，十分契合。鍾教授指出：「台灣的英語教學可以從過去的英語教科書之編輯內容、方針、目標及理念中整理出一條明晰的發展軌跡。約而言之，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到1955年，期間很短，這個時期無固定的教科書，採用的是文法翻譯教學法(Grammar-translation)。第二時期是1955到1968年，英語教學始於初中，也沒有統一的教科書，卻是各家爭鳴，其中以遠東、世界、環球、正中、復興、海國及開明的版本較為流行。這個時期的教材明顯地反映出聽講教學法(Audio-lingual approach)的流行。從1968年以後，台灣的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並且以國民中學（國中）代替了初級中學（初中），英語教科書也有了統一的版本。這個時期的教科書又可細分成四個版本，分別代表聽講教學法、直接教學法(Direct method)、認知教學法(Cognitive approach)、及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

民國42（1953）年，筆者初中一開始所使用的英語教科書，就是沈亦珍教授所編、復興書局出版的早期固定英語教材。



民國40（1951）年，沈亦珍教授所編、復興書局出版的英語與文法教材。（翻拍自國家教育研究院典藏圖書）

沈亦珍教授（1900年－1993年）學養甚深，他於1933年赴美國進入密西根大學，獲教育學碩士學位後，又轉往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1936年獲



博士學位；1949年後先後任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台灣師範大學英語教授；所編寫的英語教材亦很實用。

在筆者上初中的年代裡，除了運氣好、能遇到英語素養佳、教學認真的老師外，所有英語教學不外乎翻譯教學，語文法規則的背誦。名校如當年的高雄中學如此，其他一般的學校，那就不用說了。

19

民國45（1956）年筆者順利考進本校高中部後，英語老師的水準，已經有了顯著的改善。然而，英語教學法仍然是清一色的「文法翻譯教學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所幸雄中的學生都很用功。從初中到高中，我們必須背誦每一課英文課文。坦白說，六年的英語背誦，加上文法的自我揣摩，奠定了筆者中學時代的英語基礎。

在高中時期，班上英文最好的同學是曾擔任過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馬偕醫院副院長的黃富源。他不但英文文法背得滾瓜爛熟，而且每天在通學於高雄與九曲堂（鳳山附近）的火車上，必定背英文，或細讀英文刊物。受到他的影響，學風甚佳的雄中學生，也都以土法煉鋼的傳統方法，苦讀英文。

鍾榮富教授所列之「台灣的英語教學第一個階段：1949到1955年」，可說是英語師資、教材欠缺、教學設備歸零的年代。然而，當年的學生奮發苦讀英文的成效與代價，可說不亞於當前英語教材充沛、教學科技發達的全盛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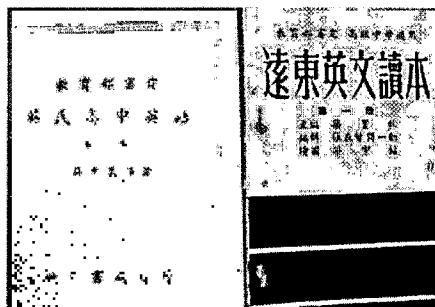
除了黃富源之外，還有一位高三的李大印。在筆者念初一時，有一天美國停泊在高雄港的第七艦隊官兵所組成之棒球隊，前來雄中進行友誼賽。在棒球場邊，筆者親耳聽到李大印與其同學，流暢地以英語跟來訪的美國海軍官兵侃侃而談。我們這些低班學生圍繞在旁，十分羨慕。這幕景象，一直縈繞在筆者的腦海裡，也成為後來輔導學生培養英語文聽、說、讀、寫能力的重要借鏡。

談到50年代的正規英語教科書，除了沈亦珍教授所編、復興書局出版的早期固定英語教材，尚有英千里教授（1900-1969）所編的初期英語教科書，於1964（民國53）年由世界書局發行。

英千里教授曾留學荷蘭，比利時，英國，愛爾蘭等國家，專攻法文與英文，1918年畢業在牛津大

學，1949年到台灣由台灣大學聘為英文系系主任。

到了1966（民國55）年，梁實秋（1903-1987）與傅一勤、張在賢合編的遠東英語教科書，開始為台灣各初、高中廣泛使用。



60與70年代由英千里、梁實秋主編的英語教科書完全取代了沈亦珍所編的教材。其後，梁實秋主編的遠東版英語教科書及遠東英語辭典，更盛極一時。民國40（1951）年，沈亦珍教授所編、復興書局出版的英語與文法教材。

（翻拍自國家教育研究院典藏圖書）

梁實秋於1915年夏考入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即今清華大學之前身）；1923年8月赴美留學。1924年夏，梁實秋在哈佛大學攻讀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西方文學和文學理論。他受教於哈佛大學白璧德新（Irving Babbitt, 1865 - 1933年）人文主義的影響；獲哈佛大學英文系哲學博士學位。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之能成為台灣英語教育人才與英語師資的搖籃，梁實秋教授居功厥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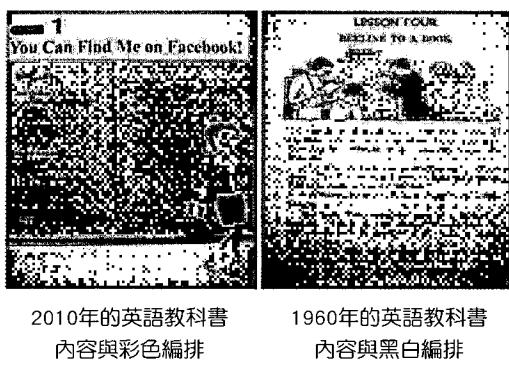
隨著台灣經濟與社會的逐漸繁榮，政府於1968（民國57）年將義務教育由6年延長為9年的教育措施，適時進一步推廣英語教育，奠定19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時，中級技術人才人力資源基礎。從這時期起，國定版的英文教科書開始藉由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編撰，廣泛推行。

1990年代以後，由於知識經濟的興起，與終身學習的到來。教育也開始提倡改變傳統的新式學習方式，視聽教育與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 GALL)開始受到英語學界的重視。到了2000年，數位化英語學習的興起，更提高了各級學校教師與學生資訊應用與英語的能力，並且調整了教育內涵。

在這過程中，英文是目前國際性共通的語言，也是接收新知與溝通的利器。因此如何提升英文的

學習能力與內涵是高中教育重要的課題。95學年度的「高級中學英文科課程暫行綱要」隨之頒佈實施。²⁰除了英語聽、說、讀、寫四項能力外，再增加第五項聽說讀寫的綜合應用能力」，且每一項的能力均再細分為「基礎能力」和「進階能力」。

隨著台灣國際化與自由化的發展，國立編譯館自2004年起，已全面退出國中小教科書編輯，僅為九年一貫課程之審定機關。英語教科書全面開放自由市場。95學年度的「高級中學英文科課程暫行綱要」(95課綱)的實施，也促成英語教科書自由市場的開放與競爭。「95課綱」的基本精神在於有效培養英語文的「語言能力」：聽、說、讀、寫四項能力外，再增加第五項聽說讀寫的綜合應用能力」，且每一項的能力均再細分為「基礎能力」和「進階能力」。此項規範直接促成了英語教科書自由市場的開放、競爭，與內容、品質之提升。從下列的圖片，可看出1960年與50年後的英語教科書編排內容與品質之明顯對比：1960年代的黑白英語教科書還在介紹傳統的索書卡；2010年的彩色教本則已經進入了「臉書」(Facebook) 檢索的新時代。



到了2009（民國98）年2月，政府又頒佈《新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簡稱「99課綱²¹」。此課綱詳列出中小學及高職英語教育一貫體系的參考指引，也就是英語文學習領域的能力架構。例如，到高中、高職階段，學生要能「能看懂日常生活溝通中簡易的書信、電子郵件、留言、賀卡、邀請卡等，並作簡短的回應。」同時，還要能「能以口語或書寫方式翻譯中、英文的句子或段落，並能書寫100-120字之英文作文。」

配合英文「95課綱」及「99課綱」，大學學測及指考也均以之為指標，作為評量高中畢業生英文能力的參考。

測驗（考試）與評量是英語教育很重要的一環。從1956（民國45）年開始實施的「大學聯考」，終於在1981（民國70）年有了重大的突破，那就是加考了「英文作文」與「翻譯」。這雖然是一小步，卻邁開了台灣英語教育內涵與大學入學考試機制改革的一大步。如今，實施良好的學測與指考，就是它的有效延伸；同時，也改變了中學英語教育的教學語學習方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2000年頒佈「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後，將鄉土語言與國小英語課程列入。2001年正式自小學五年級實施英語教育。至2005年，則下修自小學三年級開始開設英語課程。然而，都會區如台北市則自小一即開始學英文。

有鑑於學習英語對學生未來一生的可能影響，大多數的家長都迷信於「學英文愈早愈好；不能輸在起跑點上。」因此，全台灣大都數的幼稚園也都開始教英語。學習英語，已經成為全民的運動。²²

三、歸國學人掀起的正規英語師資培訓

1949年政府播遷來台，也開啟了台灣英語教育政策的原點。除了1950年代筆者高雄中學的英語學習經驗外，台灣也開始逐漸有歸國學人掀起正規的英語師資培訓工作，為台灣建構了初始的英語訓練人才。

早期任教於台灣師大英語系的湯廷池教授、屈承熹教授，與董昭輝教授等學者，在亞洲協會的資助下，於1960年代到德州大學接受了完整的語言學與英語教學訓練，由Rudolph Troike教授親自指導。學成之後，全部返國執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除了延續由梁實秋教授主政的英語系，並與當時的資深教授楊寶乾、楊景邁，共同擔任起台灣英語教師培育的任務。

梁實秋教授後來又擔任師大文學院院長，更進一步推動台灣的現代英語教育與英語師資培養計畫。

歸國學人湯廷池教授指出，歐美結構學派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早於40年代到50年代之間經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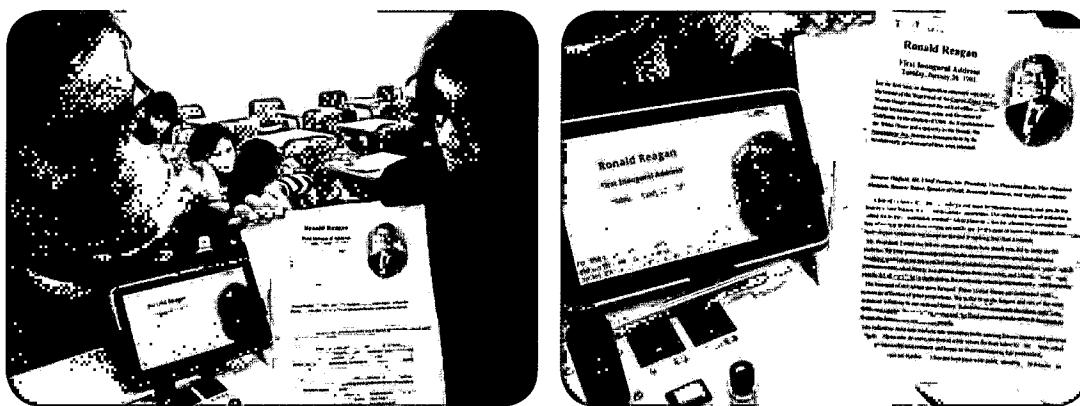
趙元任博士²³、李方桂博士等先進語言學家傳入台灣，並且廣泛應用於語言學的分析、研究，與英語教學理論的探討。²⁴到了50年代末與60年代初期，臺灣師範大學（當時尚稱省立台灣師範學院）英語系的林瑜鏗、陸孝棟、傅一勤、張在賢等幾位教授，先後在美國密西根大學攻讀英語教學以後，在亞洲協會資助之下成立英語中心，並建立我國第一間語言實驗室(Language Laboratory)，首次把在美國結構學派所孕育之下發展出來的「口述教學法」(Oral Approach)，引進到英語師資的養成教育方面。該英語中心由林瑜鏗教授擔任主任。英語教學中心採用新式「直接教學法」(Direct Method)，對台灣在60與79年代的英語教育，及英語教師培養，影響至鉅。

到了80與90年代，由教育部規劃的「中學英文教師在職進修計劃」也開始大規模進行。除了在國內的在職學分班外，也有遠赴國外的進修班，積極培育在職英語教師進階英語文能力，與更有效的教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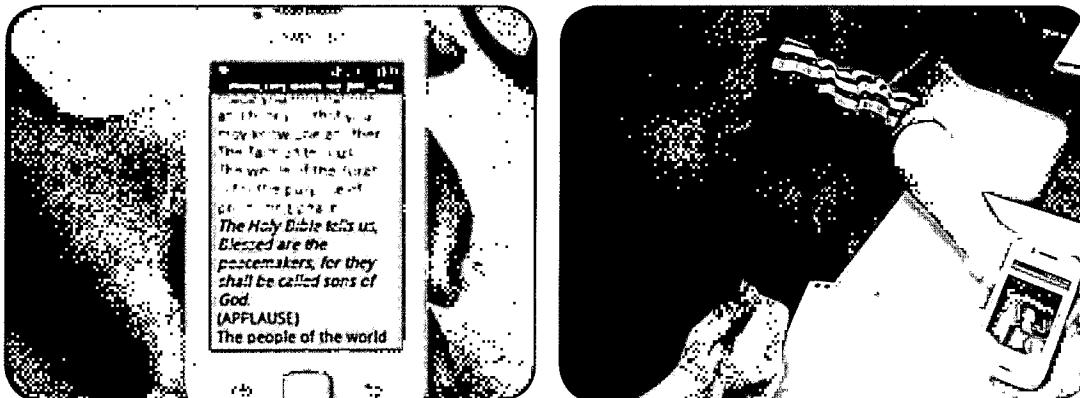
除此而外，70年代在台灣師大設立的「視聽教育館」也是推動初期「多媒體」，與現代數位與線上英語教學的先驅；可見當時英語師資培訓已朝向多元與務實的方向推動，並與國際接軌。

在此之前，台灣僅靠著1960年代的「美軍電台」(Armed Forces Network Taipei ~ AFNT)，提供接收全英語廣播的機會。台美斷交後，AFNT 改組，並易名為ICR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adio Taipei 「台北社區電台」)。其功能相同，內涵則更充實，且可透過數位化節目，提供有志歷練英語聽力的人，最佳的方便選擇。

1970年代的「空中商行專」電視英語教學，開啟了台灣社會大眾學習英語的新境界。到了1980年由中華電視台以「超高頻」播出的「空中大學英語教學節目」，引起全民學習英語的蓬勃熱潮。電視英語教學的興起，成為台灣現代電視化與數位英語教育之先驅。最後，發展成現今無遠弗屆的網路英語教學。



21世紀台灣英語教育新境界：學生將教師傳送之資料下載於 iPad / iPhone，藉此預習、上課，與複習。



四、近代英語教學法的引進與實踐

成立於1946（民國35）年的台灣師大英語系，是台灣培育英語教育人才的重鎮。在梁實秋教授的領導下，師大英語系早於1955（民國44）年就著手為實驗及改進英語教學法、增強學生之語言訓練，並在美國亞洲協會的贊助下，設立英語教學中心，成績斐然。

西方的英語教學法不斷更新，同時也陸續引進台灣的英語師資培訓學府，如台灣師大，以及後來的高雄師大、彰化師大，與政治大學等校。

英語教學專家Jack C. Richards在“30 Years of TEFL/TESL: A Personal Reflection（英語教學三十年之回顧）”中列舉出60到90年代的各種英語教學法。其中包括文法翻譯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聽講教學法(Audio-lingual approach)、直接教學法(Direct method)、默示法(Silent Method)、語言溝通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認知教學法(Cognitive approach)、能力本位教學(Competence-based)、合作式教學(Co-operative Learning)、任務式教學(Task-based Instruction)、學科內容語言教學(Content-based)、文體式教學(Genre-based)、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及另類評量(Alternative Assessment)等。²⁵

上述的英語教學法均在台灣不同年代的英語教育發展過程中，陸續引進，並使用於英語教學。然而方法歸方法，最有效的英語教學法，還是需要專業英語教師本身具備優質的英語文聽、說、讀、寫、譯各種能力，同時還要有創新、實用、熱忱，與因材施教的觀念。早期的各級學校英語教師，從梁實秋、英千里、趙麗蓮、楊寶乾、楊景邁等，均具有此種熱忱，堪為當代培育英語師資的典範。

參、改善英語教育的新思維：結語與建議

六十年來，台灣的英語教育推動，由筚路藍縷轉化為高度興盛，最後卻在教學方法與教改觀念、英語師資培育政策的落差、學生的學習態度，以及一般國中、高中、高職過度偏重考試與文法教學的誤導，導致成大學生及一般社會大眾的英語能力無法有效提升。台灣面臨空前的挑戰；其情況有如狄更斯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一開始所

寫下的感嘆：「這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惡劣的年代」。從「最美好的時代」來說，台灣的英語學習環境、先進教學軟硬體、數位學習設備和教育資源等，應有盡有。全民亦均有重視英文、培養優質國際人才，與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高度共識。然而，在此種有利於英語教育的現況下，我們台灣整體的英語能力，並沒有跟社會的快速發展成正比。在國際英語檢定測驗如托福(TOEFL)、雅思IELTS)、多益(TOEIC)中，台灣的整體表現均欠理想。以2007年涵蓋「聽、說、讀、寫」的新制托福網路(iBT)為例，中國大陸與韓國均達78分；台灣卻僅有72分。

三年後(2010)，台灣的托福成績仍然沒有進步，為亞洲倒數第十。相較於韓國的81分、中國大陸的77分，台灣的76分仍有待加強。自新托福開辦以來，台灣已連續五年都輸給星、韓、港、中等競爭國家。其中，韓國這幾年的托福、多益測驗，都明顯超越台灣。²⁶

台灣英語文落後的基本原因，主要是國、高中的英語教育普遍地偏離基本實用導向的教育觀念；缺乏閱讀素養與死背英文文法、單字的僵化方式，都是阻礙英語能力提升的因素。

前(2009)年3月13日的《聯合晚報》有一則寫實的報導：「台灣學生們為何『菜英文』」。該報導明確指出台灣英語能力低落的現象：幼稚園、小學輕鬆說英文；國高中拼升學、死背文法；大學進入(英文)學習休眠期；進入職場才知程度差，以致於花大錢進補習班重新學英文。

為了全面提升國人的英語文能力，以便迎向全球化的機會與挑戰，全國上下均不斷在努力改善英語的學習成效。政府相關部會也均用心良苦，卻苦無治本的有效之道。筆者謹提出下列建議，藉以改善當前英語教育所面臨的根本問題。

一、行政院「提升國人英語力行動方案」的省思

為了因應台灣全民英語力進步的遲緩，與落後於國際競爭對手如韓國、中國大陸、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的現象，由行政院曾政務委員志朗在2011年1月27日召集的「提升國人英語力行動方案」研商會議中，特別對產、官、學界提出「由上而下」(Top-



down)的全民英語教育檢討與策略規劃。具體措施包括：現行學校英語文教育及創新作法、英檢認證實施、各部會暨所屬機關辦理提升國人英語力作為、民間企業提升英語力方案，以及現行相關計畫策略措施之檢討。會中並討論、分析亞洲國家提升英語力的策略與實施方案。如今，「加強各級學校英語文教育」已列為優先方案，並針對國中小、高中職、大專校院，及建構國際化公務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s)等各階段，責成各部會分工實施。²⁷這些具體可行的方案，宜由行政院層級會同相關部會，持續執行與管考；切勿因人事的更動而有所改變。

為了有效落實「提升國人英語力行動方案」，筆者認為最重要的莫過於充實優質英語教師人力，並永續提升其專業知能；如此方能精進教學品質、提升學習成效。除此而外，加考英聽、口說及基本英文寫作能力、改革大一英文活化教學，與鼓勵大學教師開設全英語授課之措施，是確保教學與學習品質之必要機制與策略。藉由各級學校的英語教育品質提升與效能保證，方可進一步強化公務人員的實用英語力。

二、重建英語師資培養的有效機制

專業英語教師培養是提升全民英語力的基石。然而，從1946到1994年執行成效極佳的師資培育制度，與英語教師養成機制，已因 1994（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十日民間教改運動的持續誤導，以及其後「廣設高中大學」的實施而不幸終止。在此教改運動所促成的「師資培育法」下，英語師資「速成」班也隨著氾濫，造成近20年來優質專業英語師資的嚴重缺乏與斷層。²⁸如今行政院所關切與密集討論的「加強各級學校英語文教育」，與「充實優質英語教師人力、提升專業知能、精進教學品質，與提升學習成效」等英語教育的核心問題，正是當年民間教改運動所排斥與忽略的；其後遺症造成了無盡的英語教育禍患。

為了挽救當前各級學校的英語教育危機，從專業與人文素養雙管齊下，再輔以21世紀的精湛教育與資訊傳播科技(CT)，積極培育優質英語師資，是當前對症下藥的基本策略。同時，循著國際化教育的前瞻思維，有效培養英語教育的經師與人師，才

是提升全民英語能力的捷徑與永續措施。

同時，1980到1990年代政府積極推動的「在職英語教師」培訓機制，宜應恢復，以便輔導英語教師瞭解正確的新式英語教學方法與實踐策略。²⁹此種思維也符合當前各國積極推動的「終身教育」(Lifelong learning)理念。³⁰

三、學測與指考加考英語聽力與口語能力

英語聽力與口語能力僅是英語教育的一環，而且必須建立在廣泛閱讀的基礎上。理論上，正常的英語教育是聽、說、讀、寫四種能力同步進行、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的。當然，在整個過程中，需要由英文聽讀說寫素養兼具的專業老師來引導。³¹

大考中心於2011年第一次成功試辦的高中英聽測驗，宜列為未來大學學測與指考的核心項目。考試範圍以普通高中必修科目英文課綱一到四學期，及選修科目「英語聽講」課綱為限。這種強調日常生活的溝通功能，並且以高中英文常用四千五百字詞為主的測驗方式，只要依循正常化的英語教學與學習方式，學生必然能輕鬆過關。然而，其對未來的全民英語教育策略，將有必然性的重大影響。

問題是城鄉差距的因素，可能造成英語老師素質的落差，以致學生的整體英語學習成效也會有明顯的差距，更遑論英語聽力的表現。影響所致，學生補習的現象便會普遍產生。然而，補習並非拯救英語聽力的萬靈丹。

其實，英聽與口說訓練不需要補習，學生可從正常教學的課堂上、網路、英語廣播、雙語雜誌，甚至是電視影集、YouTube、線上國際新聞(Online international news)等，得到歷練的平台與機會。

只要有優質的英語教師輔導，再善用台灣近乎無限的英語學習資源，高中生與大學生的英語聽力暨寫作能力培養，均大有可為。

四、設立全英語電視台

設立全英語電視台，可提供無障礙的英語學習，同時藉由愈來愈多的來台外籍人士瞭解台灣，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的多重功能。有關設立全英語電視台的議題，政府已經討論、規劃了十幾年，如

今卻仍一籌莫展。

反觀韓國，自1996年成立了24小時播放的「阿里郎英語視台」(Arirang TV, Korea)後，如今已將韓國的文化、社會、藝術、科技、國情等相關資訊，全方位地以英語報導，並透過衛星傳送到全球188個國家。³²也難怪韓國人的英語能力逐漸超越台灣人，而且國際能見度也扶搖直上。韓國的「阿里郎英語視台」正是台灣可以借鏡的楷模。

五、國家考試與人才甄選增加英語口試項目

國家考試與政府人才甄選時，目前僅涵蓋閱讀測驗、文法理解、英文作文，與翻譯。未來的檢測建議儘速增加英語口試項目。如此方可引發社會大眾及公務人員英語學習的動機、擴展背景知識，以及維繫終身學習的信念。雖然此舉耗費時日，但從長遠的國家利益來衡量，這是必然的途徑。為了落實此計畫，政府各部門間也應該協調資源的整合。

六、大一新生英語能力重建

現代大學生英語能漸趨衰退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國、高中英語教育過份偏重考試導向與文法教學所致。有些高中甚至在高三階段天天密集考英文，而非藉由生活化的「讀、聽、說、寫、譯」正常教學來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如此一來，學生的英語文學習動機自然會消失。可見優質英語師資對學生與未來人才培育的重大影響。

在此現況無法改善的現況下，匯集最具風采與教學成效的大學教師，規劃並進行創新的「大一新生英語能力重建」課程，實乃當務之急。實施的策略為改革制式的「大一英文」，改以配合各科系屬性而編撰實用、創新的主題，供學生在教師的活化教學中，進行閱讀、討論、聆聽、寫作的活動，從而培養實質的英語文能力。³³

大學教師除了學術研究外，有效教學亦是其天職。目前各大學依教育部規定必須設置的「教學卓越中心」，應該協助落實此項「大一新生英語能力重建」任務。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自2011年所規劃的「大一新生暑期英語密集訓練營」課程(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就是一項足可借鏡的嘗試。

大一階段是當今台灣回歸正常化英語教育、提升英語文能力的最後防線。從大一新生入學開始，

各大學必須仿效國外知名學府，積極落實輔導新鮮人融入學術殿堂，輔導並引發其學習專業與重建英語能力的動機。³⁴

七、大學全英語教學開設的必要與策略

為了藉由課程提升大學生的英語文能力，進而培養產、官、學界的英語人才，大學各相關科系「全英語教學」的措施，宜應加緊推廣。此舉也符合教育國際化趨勢，及拓展招收更多優質外籍生來台就學的目標。外籍生多寡，是當前國際教育評比的指標之一，同時也是激發台灣大學生廣結國際善緣、培養國際觀、落實英語能力提升與國際溝通的基本途徑。

對「全英語教學」措施的執行，各大學宜有輔導與鼓勵的配套措施。藉由全英語教學的實踐，大學教師當然需要花費頗多時間與精力進行課程規劃與準備。然而，此乃教師的基本任務。有效的實施，可藉由教材與教學活動提升師生英語閱讀、表達、分析，與寫作等能力，進而達臻教學相長的教育目標。

高雄醫學大學天然藥物研究所所長張芳榮長期實施全英語教學，不但促成本地生與外籍生藉由英語達成有效的學習與交流，同時讓他在國際會議中，發現自己的英語快速地進步了。張芳榮教授的教學與研究成就，就是大學全英語教學的典範。

原文書是大學師生可用以實施全英語教學的基本教材。台大經濟系教材使用的教科書，*Microeconomics* (Don. E. Waldman, 2004)，內容實用、新穎、具啟發性。只要教師妥為準備，再輔以多媒體與生活化教材，則必有助師生英語學習與能力提升，同時順理成章有效落實全英語教學的高等教育任務。

總而言之，及時培訓優質英語師資、活化各級學校英語教學法（尤其是大學的英語教育）、擬定國家英語教育政策、鼓勵英文閱讀、推動國際交流、增加國家考試與人才甄選中的英語口試項目、啟蒙大一新生、落實全英語教學等任務，應將有助於全民英語文能力的有效提升。這也是體認台灣英語教育承先啟後的歷史發展，及時提升高等教育品質，進而培育國家人才的當務之急。

（限於篇幅，注釋處請見本會網站）

